

论教育研究的伦理自觉

罗生全, 靳玉乐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 重庆市 400715)

摘要:教育研究的伦理自觉阐释了其知识创造、认识论贡献和方法论创新等内在价值, 设定了其特有的组织规范、文化规范、学术规范和关系规范, 进而确立了关怀伦理基准的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研究主体的理性自觉和研究伦理文化塑造等未来走向。

关键词:教育研究; 价值; 伦理自觉; 价值表达; 规范自觉; 实现策略

中图分类号:G40-0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1-0049-06

任何有价值的科学研究很难做到纯粹意义上的“价值中立”, 无论选择何种研究范式都会在研究取向、研究主题选择、研究设计、研究资料收集、研究过程的控制、研究结论的解释及其应用等环节中有不同程度的价值介入。这种价值活动必然形成以价值主体为核心的关系网络, 进而产生各种危害社会准则、个体尊严和研究无效等伦理问题, 作为关注人的教育研究, 必然应首先规避这些根本性问题, 实现伦理自觉。

一、教育研究伦理自觉的价值表达

教育研究具备知识创造、认识论贡献和方法论创新等内在的价值特性, 而伦理审查下的教育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其内在价值。首先, 教育研究伦理自觉的价值论澄明。伦理意义上的教育研究提出了不一样的知识建构和真理主张, 在批判继承传统实证主义、男性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观基础上, 坚持关注具体生活经验的根本性、对话在形成知识主张时的作用、关心的伦理学和个人责任的伦理学等^[1]价值标准, 崇尚个人表达、情感和同情等价值, 通过互动的“呼—应”式对话建构生活意义上的有效知识。研究伦理的价值维度为知识创造提供了基本的问题假定, 一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道德关系, 即价值观问题, 表现为研究者的理论假定与研究场域所建构起来的各种知识观念, 对于知识由之和为之而产生的那些人都具有伦理责任; 二是受研究者与研究内容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 即正义问题, 关注实践中的道德原则, 如理论研究者与教师、学生、学校及其他研究者和研究机构之间所构建的复杂的多元主体间关系。毫无疑问, 伦理价值导向下的教育研究拓宽了教育知识增长的维度、强化了知识创造的价值性、夯实了知识增长的实践土壤, 进而将教育研究的知识创造价值植根于研究场域中, 将知识定位于一种基于主体间复杂身份交互下因情境而定的一种资源, 透过主体间的观念碰撞与价值协商形成有意义的复合型知识体系。

* 收稿日期: 2012-04-23

作者简介: 罗生全, 教育学博士,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副教授。

通讯作者: 靳玉乐,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基于本土文化的西南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09YJC88084), 项目负责人: 罗生全;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西方发达国家课程理论的发展逻辑与方法论研究”(SWU1309104), 项目负责人: 罗生全。

其次,教育研究伦理自觉的认识论表征。科学团体共识对于研究对象选择与研究数据的拒斥和强调体现了一种特有的认识论,其过程与结果的可能“非科学”生成了教育的伦理维度,有必要在研究个体与研究共识之间确立一种新的认识论基准。伦理价值是一个综合概念,它关涉研究者的心理、文化、知识背景和价值结构,在与研究场域和研究个体境遇的过程中不断生成新的文化和价值要素,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建构新的心向,透过认识论、存在论和理论之间的不断辩证建构新的心智状态和复杂场域中整体思维的认识论定向,形成独特的对于研究主题和概念体系的认识论理解。伦理视角下所建构的整体思维方式并不意味着对个体的排斥,个体的专业素养和伦理意识不仅直接制约着研究的“效度”,研究实践中的情感、感受和各种关联性决定了认识的质量和负责,影响着教育知识的建构。从这种意义上讲,教育研究的伦理自觉体现了个体主义的知识建构和整体主义的研究控制,保持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研究张力成为新型的认识论表征。

其三,教育研究伦理自觉的方法论创新。教育研究的跨学科支撑和具体多元的方法为其复杂性实施提供了某种“认识上的混乱”,需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审查教育研究的基本假设、研究程序设计及实施保障中的伦理之道与伦理之术,实现学术研究的自律,避免恶意曲解事实或“功利化”学术。教育研究的“人”性凸显了教育研究的“互动”,而“任何互动都需要相互‘交换’来维持下去”^[2],交换的核心价值就是伦理关怀,从道德审查和方法论角度对研究质量予以质疑,从而体现了研究者的伦理责任,理性审视方法本身所带来的伦理风险。基于伦理的方法论为教育研究确立了自反性的元研究,“对我们各种各样的社会定位之间的相互影响给予更多的关注,对这些社会定位如何与我们在分析材料的时候我们个人经历的特殊性相互交叉给予更多的关注”^{[3]126}。由此,研究者应全面审查其自身角色,确立“知情同意”、“尊重与平等”、“无伤害和受益”的方法论原则,了解其界限、定位以及与研究对象之间传递私密信息的特殊方式,体现抽象、反思和公正的人际伦理关系,尽量贴近尤其是教师和学生对于研究问题的“真实”表述,做到对被研究者的“移情式理解”,进而反思分析材料的过程中影响个人的、人际的、制度上的、情感上的、理论上的、认识论上的以及存在论上的因素,最终审查研究结论所带来各种伦理风险。

二、教育研究伦理自觉的规范诉求

伦理规范“尤其是为教育实践给予一般性指导方针的策略,与法律允许的范围相比,适用于一种更广泛的理解”^[4]。这意味着教育研究伦理规范或标准的复杂性,也强调了实践应用中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出一一般意义上对他人价值和尊严的尊重,坚持公平、真实、不偏不倚、保密、正直以及追求卓越的基本研究伦理,满足承诺服务教师、学生、家长、教育工作者、其他专业人员和众多社群的需要,也构建了一系列“你不该做的事情构成的规范”^[5],以否定性的/禁止的方式呈现伦理原则,体现伦理道德的教育研究强制性。当然,研究实践与伦理指向之间的鸿沟意味着教育研究过程非伦理性存在的可能性,保证伦理规范的有效性不仅仅在于确立一系列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具体伦理条文,还在于通过这些条文的辅助性措施将其“内化一系列价值观”^[6],紧密结合教育研究专业特性的自觉意识,提升研究者的专业实践知识。虽然符合规范伦理的程序或指南有可能排除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样本,如书面的“知情”同意有可能排除一些潜在的研究个体,不能基于信任建构长期的研究关系。但这并不说明规范伦理的价值失范,而是体现了一种保持规范伦理与应用伦理有效张力的基本价值诉求,透过弹性的规范和研究者的主体自觉在当下(ongoing)处理这种伦理困境。

基于伦理的基本价值及实践设定,首先,教育研究应有伦理组织规范,确立伦理审查的组织体系与伦理准则,组织体系保证了教育研究伦理审查的规范性与一致性,明确了有关研究的操作规程与实施制度,如伦理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审查体系、方式与类别、流程、跟踪审查和档案文件等,伦理准则确保了教育研究的伦理要点、展开研究的基础性条件等,坚持基本的研究共识,满足诚实、精确、客观和高效的原则^[7]。诚实意味着研究者应忠实地提供信息,实事求是;精确意味着细心地设

计和进行科学实验,准确无误地记录和报告结果,杜绝粗枝大叶;客观意味着让事实说话,避免主观和偏见;高效意味着合理支配和精细使用资源,力戒浪费,对社会和公众负责。具体而言,教育研究的育人本性首先要求教育研究者应有崇高的个人操守,将人性发展作为研究的起点和终点,而非作为展示自身荣誉和相关利益的职业。任何学术研究都有其共有的基本学术心向,教育研究的特殊伦理准则决定了研究者应将尊重和信任作为首要的研究准则,在一种现实人为建构的良好研究关系中体现负责任的研究行为。研究伦理的长期缺失不仅造成了学术风气和学术行为的失范,更造成了研究成果的现实转化困境,关系着教育价值的真正实现。教育的灵魂体现在时代价值与政策规范中,各种教育政策法规及指南不仅体现了教育的研究性,更体现了教育研究的规范性,这决定了教育研究对法律法规的尊重,对研究组织基本准则的遵守^[8],既从学理的角度关怀政治和政策决策,也应坚守基本的研究程序,以伦理向度作为调节各种利益关系冲突的基点,以理性建构的教育发展愿景作为研究重点,兼顾规范伦理与应用伦理的教育研究价值,体现重研究本身与研究实践价值的和谐共生。

其次,教育研究伦理自觉的文化规范。伦理是文化的产物,文化是伦理生存的“土壤”。虽然伦理道德的发展取决于其“理论自身的逻辑延伸力量”^[9],但文化的连续性和创造性发展所体现的文化特质与思维敏捷性,更引领和规范着伦理的“现实生产”,产生了符合当前文化体系的道德规则与体系。教育研究的个体文化性与集体文化性确立了文化基础上学术研究的文化生成和再生产伦理向度。教育研究伦理文化的教育功能应着重体现为政府、专业和学术团体通过建构一定的教育研究标准、完善和监控教育研究程序,强化研究者对伦理情景以及相关法律、规则和指南的认识,增强其伦理敏感性,并能够批评性地分析自身的道德立场,审慎面对新问题的伦理性,提高其伦理推理能力。伦理推理能力的形成旨在彰显伦理价值的“至高”价值,产生一种道德动力和决心,最终形成一种完美的道德人格和能力,实现个体的价值自觉。文化意义上伦理规范要求教育研究者必须审慎考虑其研究问题、研究基础、研究过程与研究场域的文化特性,尊重当地文化习俗和个体文化权,保护个体与所处文化圈下集体的利益否则就是反文化的研究。因认识论、哲学观和伦理观的差异,不同文化之间有着不同的伦理规范,跨文化研究者应增强文化适应性,在认识文化差异性的前提下,保持研究目的与文化规范之间的张力,找准伦理规范中的道德标准差异,尊重和保护当地的伦理准则,建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合理的关系伦理。

其三,教育研究伦理自觉的学术规范。教育研究的伦理规范确定了教育研究的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不能脱离学术研究本身,并紧密联系中国人文学术的学理性。教育研究的人学本质决定了其研究不是孤立单一的研究,摒弃切割式介绍和阐释的“片面拿来式”研究,需要对知识点在整体教育结构中的关联进行历史透视,审视当前教育发展的基本走向和价值追求,在历史演进中审视其理论的适切性和延展性。同时,不能仅仅停留在以所谓“本土化”的“时代口号”进行所谓大原则、超宏观的“民族性”研究,当然也不能“以民族式的文化政治对应西学的所谓话语权或想象性霸权,而没有对这些连接点进行洞察或实质性的推进”^[10],否则,任何看似“科学”的研究目标、过程和结论都是不符合伦理性的,背离了作为民族文化特性、个体话语权以及学理性的内在价值。从学理规范意义上说,学术研究的内在价值不仅关注外部的技术性规范和对研究本身、研究对象的尊重,更体现为原创性研究和思想意义的追求,需要教育研究者反省其研究立场,重新思考研究的基本假说、命题、方法和论述范围,以既有研究成果为基础,要么给予现代意义上的诠释,要么借鉴包括西方在内的不同教育流派和研究个体所产生的理论和方法论资源,审视研究者、教育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等的经验系统,进而阐发出新的解释系统,形成当下最有价值的研究体系和规范。

其四,教育研究伦理自觉的关系规范。教育研究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活动,更是一种伦理活动,甚或是一种伦理规范下的技术活动。伦理与技术的结合确立了教育研究的关系性伦理,研究者严格按照教育的一般规律和终极价值所赋予的职业道德水准,以提高个人道德状况为契机促进研究

过程的公平正义。伦理意旨下的教育研究道德正义确立了研究者应“以平等的精神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求每一个人自觉维护自己的平等权利,履行自己的平等义务。”^[11]平等正义的道德指向首先要求教育研究者应根据平等的精神处理各种教育研究中可能出现的复杂问题,将教育研究过程中的研究合作者、教师、学生以及其他教育工作者等研究对象看成具有和自己同样的权利和义务主体,有着同样的价值和尊严。其次,教育研究者应具备移情的思维,不能将自己作为一个纯粹的“客观”主体,应结合他者的文化处境和心理感受设计研究过程和选择研究方法,“要留意我们的行为,甚至也要关心我们的感受”^[12]。再次,具有一种契约的研究观念。教育研究者应明白自身的角色与责任,在推进研究进展的同时,有效保护尤其是作为未成年人的各种权益,并适时给予研究对象时间和经济上的尊重。最后,研究者应具备角色意识,审视自身的研究取向、方法设计的人文性、过程控制的程序性,以伦理原则变换不同场景中研究问题的角色期待。

教育研究者的专业角色决定了“他就不再是一个自由的人。……服从于专业群体的伦理原则和成员标准,以及服务的一般目的”^[13]。研究者应对研究目的、限制条件、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研究实施计划等作出明确的交代,不仅为研究对象提供认识自身进行研究的各种利益与弊端,自己作出是否参与研究的判断,也为研究同行提供一种客观的认识该研究伦理性的研究材料,再现该研究的思维场,判断该研究的外部效度,并根据研究设计的资料收集计划与现实的资料收集审查所得出的推论或者结论,从内部效度层面审查教育研究蕴含的内在伦理价值。研究过程中,专业人员要面临多种角色冲突,有些专业人员本身就是从业者,有些专业人员以自我专业角色为基础将自我理解替代为对象理解,这种不自觉的伦理行为损害了“自愿”同意的伦理规范,没有在复杂的研究关系中厘清其角色定位。角色混乱的研究伦理失范有必要在复杂的研究关系中确立“诚实、尊重他人的自主性、公平”的个人伦理原则、“公正无私、勤奋、责任心”的专业伦理原则和“社会责任”的普世伦理原则。

三、教育研究伦理自觉的实现策略

(一) 关怀伦理基准的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

任何科学理论和方法均可以作为解释存在的可能性,但需对科学的傲慢及对信仰、自觉和习俗的主张进行限制,关注人性价值的道德性。也就是说,不能打着研究的幌子进行着“非人”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行为,而应该在充分尊重人性的基础上审视解释客观实在的理论工具与方法,并尊重其他理论范式与方法对不确定性消除的价值。方法的伦理性也应体现为对同行研究的尊重和借鉴,坚持使用研究过程与研究结果展示的同行评议成为研究伦理自觉的必备条件,“以一种类似分析进程的方式向中立的同行们展现自己的研究,旨在探讨研究进程的各个方法,以免这些问题仍只是含混地隐藏在研究者的内心之中。”^[14]随着定性研究在教育研究中的不断深化应用,定性研究中相当流行的反面案例分析等也应为修订和建构新的研究模式贡献方法论和方法技术上的作用,不断提升研究的效用性。同时,一些具体的诸如充实参考资料、成员自查、深描、可靠性审查、确定性审查、自省记录等新兴研究技术也应综合应用于教育研究之中,整体与综合地考察基于研究问题和研究文化关照的内部效度与外部效度,促进研究结论的推论质量和研究适用性以及研究理论水平的提升。

“方法论训练是这样一种手段:将对信息的歪曲降到最少,同时最大限度地扩大相互理解的机会。”^[15]教育研究的教育性及道德价值阐释了教育研究的强烈“目的性”,在尊重个体感受、观点、态度和其他个性特征的基础上审慎选择和使用研究方法,避免唯方法意义上教育研究的伦理失范。从研究系统上看,研究者应创建出一种专业信任气氛,营造参与者的利他主义感觉,使其“忠实”地展现其内在的真实想法,捕捉准确的研究信息。一旦开始研究任务,研究者应告知参与者有关研究的“真实”目的,实现教育的道德教化功能。从研究的具体技术上看,有关定量研究中的诸如问卷或量表以及访谈等方法均应在语言选择、语言表述等方面深切关照不同研究对象的认知特性及行为特性,建构研究问题与研究对象之间的适应性,避免造成研究对象的“敌对性”参与和研究设计对研

研究对象的人性漠视;定性研究中诸如观察、访谈、文件分析等方法首先自审其伦理合法性,是否违反了价值伦理、规范伦理和技术伦理的内在规定,如儿童学习行为与交际行为记录时摄像机或录音机使用的限制等,还应对综合收集的信息进行整合与综合判断,避免投射性研究,进而得出偏见性结论,同时,一些辅助性的技术要求也应体现其中。

(二)培养教育研究主体的理性自觉

伦理基于理性上的自觉^[16],遵循理性的感悟与律则。本体意义上的教育研究体现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人际交流和价值观的深层交流,体现为心理结构意义上的交流理性。交流理性一般具有交易理性和关系理性两大类型。交易理性主要关注研究过程中通过经济资本来实现研究目的和控制研究过程,体现了交易效用的原则,往往透过经济利益建立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研究合作关系,这也是西方常用的教育研究原则。而关系理性则更多体现为通过社会资本予以实现,研究费用主要体现为维护一定的群体关系而不断强化和深化研究资源的选择和研究对象的选择,通过建立强有力的关系圈而获得研究对象的认可,这是东方教育研究的主要范式。我国的教育研究往往植根于研究者与教育管理者、教师以及学生的良好关系基础上的一种研究范式,通过良好的关系资本获得具有权威性的数据和深层次的价值表达,最终获得最符合科学法则的研究证据。从理性的发展上看,“在每一种文化里这两种类型的理性都存在”^[17],西方教育研究并不排斥关系理性的存在,而东方教育研究也确实存在交易理性,只不过如何透过建立一种研究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和交往关系而实现道德、伦理和义务的互动关系成为教育研究的理性选择。也就是说,我国的研究应充分尊重植根于本土文化的关系理性基础上,合理探寻适当的关系理性,构建以本土心向为基础的、以关系理性作为核心机制的教育研究的交流理性,实现研究主体的理性自觉。

教育研究者既是专业研究者也是“普通的人”,这引发了研究者对于职业伦理原则与个人伦理原则的冲突而进行的伦理选择。作为“人”的教育研究者必然面对教师、教育行政人员和学生等出现的违背日常生活中诸如教师对教育法的违反、学生校园暴力、教育行政人员不作为等个人伦理,挑战高于研究伦理的基本准则。针对这种伦理冲突,研究者应首先实现伦理意识自觉,遵循职业伦理,透过理性的研究结论促使更广泛意义上的个人伦理的解决。由此,研究者的理性自觉体现了一种对道义责任的思考,在完成研究任务的同时是否可以给予切实的帮助。对于特殊儿童和其他特殊研究对象而言,教育研究最根本的道义问题应首先考虑我们的研究基准,即是否应该去研究这些儿童,如对具有犯罪行为的青少年研究应坚持心灵上的相互尊重原则,旨在关注事实而非加剧其心理负担。其次,研究者应坚持尊重研究对象完整人格的伦理基调,不能为了研究需要不择手段挖掘对方不愿意暴露的隐私,以致造成心理创伤。最后,研究者的道义责任体现为对研究对象的现实帮助,透过研究材料获得的研究结论从他者心灵解放的角度提供发展建议。深层次意义上说,教育研究应处理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在做研究和研究功能之间保持张力,以中庸理性统摄研究本体、“客观现实”与研究解释之间的伦理向度,展现“客观研究”的主体功能,形成更有价值的意义创造。

(三)塑造教育研究的伦理文化

在“文化多元”的后现代今天,众多相互不可通约、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和理论范式决定了教育研究永远不可能“客观”、“中立”,“研究”其实就是“写文化”^[3]。文化体现了一种关系,深刻反映了一定社会情境、社会关系、制度结构及历史背景,昭示了特定个人及群体的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教育研究者也就不能将文化独立于研究对象之外。教育研究伦理审查的文化性,不必拘泥于传统意义上义务论伦理学、后果论伦理学和技巧的德性伦理学的设定,也不必争执于不同理论流派和不同研究群体的功利主义伦理模式,而是基于研究场域中文化的复杂性,以一种更加自反的伦理学模式做出合乎伦理的研究决定与脉络化推理,规划足够的时间去建立信任、了解“文化”,以此检测出源信息或研究者自身之偏见的错误信息,透过持续的观察辨识与其研究问题最为相关的社会场景特点和因素,建构研究的“深度”,增强基于伦理文化体系下研究结果的信用性。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

伦理“上位”，尤其是针对儿童的研究立足于道德与伦理的文化时段，走向关涉个人的、立足关怀的伦理模式，建构一种植根于个人经验、研究语境以及人际关系的研究文化，书写微型的道德故事。教育研究的关怀功能诠释了研究过程“对等的双向性”，研究共同体中的研究者们、研究者与资助者和研究对象之间虽有着不同的伦理思考方式，但理性批判精神成为研究的文化内涵，将研究的终极价值作为调和不同冲突的准绳。

学术机构与团体的文化性与文化功能确立了研究者共享的一套规范、价值观、信仰和构想，以及实践这些取向的行为和其他人为因素（如象征、意识和语言），其中伦理（或道德）氛围是其关键组成部分，为具体的研究行为作风提供背景的主导性道德信仰。教育研究机构与教育政策决策机构以及其他学术共同体应致力于营造一种环境，使教育研究者能够认识到在该文化氛围内界定的负责任的研究行为（作风），尊重和理解教育研究规范的重要性，攻克教育研究过程中的道德两难，并能识别以及提出研究作风上存在差异和冲突的不同标准，帮助其形成伦理性人格，促进整体科研文化的伦理重建。实践表明，学术伦理文化建设最直接的因素是教育规划者、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以及管理人员和学术团体领导对伦理价值与伦理规范的重视、政策和实践的一致性、伦理问题的长效审视以及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讨论及问题解决，由此，教育研究的学术引领者应旗帜鲜明地对高尚道德标准予以支持，并关注和公开支持负责任的研究行为，发挥伦理标杆的价值。研究伦理的文化功能在于在道德与竞争之间建构一种张力，在保证学术道德优先性的前提下通过奖励制度和政策引领道德的研究行为，构建惩戒违背道德行为的制度规范和长效机制，并透过监控与质检运行机制使这种文化功能达以最大化，促使研究者长期将恪守教育研究的道德标准置于首要目标地位。同时，伦理文化的效用还需要教育的力量。教育行政部门、各种教育学术团体和机构均应有教育的责任，通过专门的教育培训以及各种有关伦理议题的学术交流形成一种共识的伦理价值观。

参考文献：

- [1] Denzin N.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Ethnographic Practices for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Sage, 1997:274.
- [2] 黄盈盈,潘绥铭. 中国社会调查中的研究伦理:方法论层次的反思[J]. 中国社会科学,2009(2):149-207.
- [3] 梅拉尼·莫特纳,玛克辛·伯奇,朱莉·杰索普,等. 质性研究的伦理[M]. 丁三东,王岫庐,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 [4] 伊利莎白·坎普贝尔. 伦理型教师[M]. 王凯,杜芳芳,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26.
- [5] BullEthics in the preservice curriculum, in K. A. Strick and P. L. Ternasky(eds) Ethics for professional in Education: Perspectives for Preparation and Practice.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1993: 209-212.
- [6] S. M. Strom. The Ethical Dimension of Teaching, in M. C. Reynolds(ed.) Knowledge Base for the Beginning Teacher[M].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9:270.
- [7] 美国医学院、美国科学三院国家科研委员会. 科研道德倡导负责行为[M]. 苗德岁,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
- [8] 靳玉乐,董小平. 教学论三十年:进展、问题与展望[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59-65.
- [9] 刘朋,胡洪伟. 论教育科学研究的伦理问题[J]. 教育科学研究,2001(12):5-9.
- [10] 何成洲. 跨学科视野下的文化身份认同[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50.
- [11] 沈晓阳. 关怀伦理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19.
- [12] A Weston. A Practical Companion to Eth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emphasis,1997:2.
- [13] Jonas Soltis. On Teaching professional ethics.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1986,37(3):2-4.
- [14] Lincoln Y S, Guba E G.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Sage, 1985:308.
- [15] 肯尼斯·赫文,托德·多纳. 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97.
- [16] 吴明隆. 教学伦理[M].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9:6.
- [17] 何成洲. 跨学科视野下的文化身份认同[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1.

责任编辑 曹 莉

and its tort liability elements is propitious to recognize and effectively regulate it, and thus to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of the infringed.

On the Ethical Consciousness of Education Study

LUO Sheng-quan JIN Yu-le(49)

The ethical consciousness of education study offer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rnal value of education study, including knowledge creation, epistemological contribution and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It sets the peculiar organizational norms, cultural norms, academic norms and relational norms of education study. What's more, it also sets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ethics of care benchmarks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the methodology system of education study, r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ultural shaping of research ethics.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Teaching Majors in Their In-Post Internship

LIAO Xiao-heng TANG Heng-jun SONG Nai-qing(63)

In-post internship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n the reform of talent-training mode in teachers' college. It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overall qualities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teacher education.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we fin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in-post internship, the students have obvious improvement on their professional qualities, and it is prominently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two ways of internship: internship by teams whose members are of the same major; internship by teams whose members are of different majors. For students who choose the in-post internship, their teaching responsibilities, self-discipline, sufficient chances of practice and fairly free environment are beneficial for their professional growth. However, some problems as repetition and less effective guidance should be improved. On the basis of exploring the students' professional qualities,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scientifically the influences that in-post internship has on students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and Happiness: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Money and Happiness

LI Ji-bo HUANG Xi-ting(76)

Time and money, with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re a key part of individual happiness. In case of low income, money, as a scarce resourc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xtent of happiness while in case of income above a certain level, money is scarcely or never correlated with happiness. Time affluence, however, is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happiness. Compared with money-spending ways to maximize happiness, several time-spending methods are employed to maximize happiness. As priming stimuli, time and money affect happiness, yet by different pathways. Money priming helps to alleviate suffering, but it also impairs individual happiness. However, time priming always helps to improve happiness. Putting a price on time will weaken individual's happiness. Differences between subjects investigated and mental mechanism require further investigation.

The Structural Model of the Urban Migrant Children's Social Adaptation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HU Tao GUO Cheng(83)

To build the structural model of urban migrant children's social adaptation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earchers have made a scale on children's social adaptation and a questionnaire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ir social adaptation. The scale and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on 1431 students in 3 middle schools and 2 primary schools. The sifting from valid questionnaires has brought 855 questionnaires of urban migrant children.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structural model, the family factor has direct impact on personal ambition, school factor, discrimination and bullying. Discrimination and bullying has direct impact on personal ambition and school factor. School factor has direct impact on